

楚辭考論

周建忠 著

商務印書館

楚辭考論

周建忠 著

商務印書館

2003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考論/周建忠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ISBN 7-100-03934-7

I. 楚… II. 周… III. 楚辭—文學研究—文集
IV. I207.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85969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Hŭ Cí Kǎo Lùn

楚辭考論

周建忠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民族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3934-7/I·24

2003年12月第1版

開本 850 × 1168 1/32

200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0½

定價: 18.00 元

目 錄

序言·····	1
---------	---

第一編 楚辭研究

1. 氣往轅古 驚采絕艷：《楚辭》的形成、作者及特點 ·····	13
2. 《楚辭》黃昏意象發微及影響研究 ·····	43
3. 蘭意象原型發微 ——兼釋《楚辭》用蘭意象 ·····	64
4. 猗猗九畹易消歇 奕奕百畝多淹留 ——蘭花栽種歷史考述兼釋《楚辭》之“蘭” ·····	78

第二編 屈原研究

5.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考論 ——兼論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 ·····	98
6. 屈原“放逐”問題證辯 ·····	126
7. 屈原“自沈”的可靠性及其意義 ·····	141
8. 屈原“愛國主義”研究的歷史審視 ·····	153
9. 尋找近真的“屈原”與“陶潛” ·····	175
10. 當代屈學考信錄 ·····	191
11. 《離騷》“求女”研究史略 ·····	200

12.《哀郢》作意研究史略	209
---------------------	-----

第三編 楚辭學史

13. 中國近現代楚辭學史綱	223
----------------------	-----

14. 精於聲訓 他山攻玉	
---------------	--

——評何劍熏其人其學其書	278
--------------------	-----

15. 金開誠《屈原辭研究》、《楚辭選注》平議	292
-------------------------------	-----

16. 文學人類學的考古報告	
----------------	--

——蕭兵的楚辭研究與弗萊的原型批評	310
-------------------------	-----

後記	328
----------	-----

序 言

自 1980 年撰寫第一篇楚辭論文以來，我對“楚辭”、“楚辭學”的愛好、欣賞、思考、研究，從來沒有停止過。事實上，“楚辭”、“楚辭學”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已經成為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楚辭研究領域，我的初步目標是，完成楚辭研究系列著作十種：

- 1.《當代楚辭研究論綱》，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 2.《楚辭論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
- 3.《楚辭評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年版
- 4.《楚辭與楚辭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 5.《楚辭學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 6.《楚辭考論》
- 7.《五百種楚辭要籍題解》（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
- 8.《楚辭學史》（中華書局即出）
- 9.《楚辭考古學》
- 10.《楚辭通考》

由此可見，《楚辭考論》是我的系列產品之一。在學術思想方面，應該說是“一如既往”、“九死未悔”。我的第一本著作《當代楚辭研究論綱》“前言”是這樣開頭的：“我向往這樣的境界：楚辭與楚

辭學的研究同步進行。”後來，我的朋友們，將它總結為“同步進行”說。

毫無疑義，學術研究與學術史研究、本體研究與史學研究，從來就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學術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學術研究、本體研究就無法深入，也缺乏參照。所以，“同步進行”，已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思路，一種理念。《楚辭考論》所收論文，仍然是這一學術思想的體現與延續。

藉此機會，我對收入本集的十六篇論文，作一簡要介紹，以便專家同仁批評指正。

一、《氣往轅古 驚采絕艷：〈楚辭〉的形成、作者及特點》指出：

- 1.“楚辭”這一名稱形成於西漢初年。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義：詩體、作品、書名。
- 2.《楚辭》一書，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於一個時代，它是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人們逐漸纂輯增補而成的，自戰國至東漢，歷三、四百年。
- 3.《楚辭》的上源是複雜、多元的，應包括保留下來的神話傳說、《詩經》中的“陳風”、“二南”及楚地民歌、《老子》等，同時亦包括中原歷史散文、哲理散文。《楚辭》與《詩經》在藝術形式上的差別不在表層的“四言”與“騷體”，更多地體現在意境、情調、抒情技巧、比興象徵上。
4. 屈原，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大詩人，是一座跨越時空的豐碑，也是一個豐富、複雜的“模式”載體。他是一位失敗的政治家，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詩人，他的思想受到儒、法、道等諸家影響而自成一家。
5. 屈原的悲劇，正源於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體現、他的“美”的張揚，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徵。
6. 宋玉作品包括：《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

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大言賦》、《小言賦》、《釣賦》、《諷賦》、《笛賦》以及《御賦》殘簡。7. 宋玉作品為“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完成了《楚辭》到漢賦的過渡。

二、《楚辭》黃昏意象發微及影響研究指出：1.《楚辭》彙聚了浩大多元的“黃昏”意象，從環境而言，該意象是自然與社會的疊合；從心理而言，“黃昏”總是與“深秋”、“晚年”，融為一體；從民俗而言，由於婚姻儀式的“昏”時背景，又體現為相思怨別母題，以男女之間的愛情婚姻體驗來表達人生追求、君臣相處的感慨；從哲理而言，“黃昏”又與“衰老”、“惜別”、“孤獨”相疊合，而派生出死亡意識。2.《楚辭》“黃昏意象”的“原型”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文明特徵，這僅是與屈原創作關係不大的“真實”背景；“娶婦以昏時”的婚姻習俗是屈原藉以抒情表白的“外在”形式；宮廷官府豐富多彩的“夜生活”與過多的夜間祭祀活動，才是屈原政治生活的直接背景；而作為貴族詩人的屈原，那敏感多愁、長夜難眠的心理特徵，才是《楚辭》“黃昏意象”的靈感觸發與主體傾向；至於楚民族和屈原對太陽的崇拜、對太陽神話系統的熟悉、堅信，則真正成為《楚辭》“黃昏意象”的“原型”。3.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楚辭》“黃昏意象”的多元內涵已經極為全面、完備，所以為後代詩人所繼承、發展，但其“外在形式”（娶婦以昏時）已不復存在，太陽神話系統的“原型”背景也變得冥昧遙遠，只是在一些習慣用詞（如“崦嵫”、“羲和”、“扶桑”、“咸池”等）上留下語義學的痕迹。因此，《楚辭》黃昏意象在內涵方面對中國古代詩歌中“高頻率”的黃昏意象，起到了開拓、定型的作用，後代僅僅是再現、擴張而不可能“新變”。

三、《蘭》意象原型發微——兼釋《楚辭》用蘭意象指出：1. 蘭花，作為一種源遠流長、內涵豐盈的文化，曾經有過“圖騰”的輝煌。

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經變成遙遠、淺淡，難以發掘的“遠景”。透過圖騰痕迹的辨認、復原，仍可追尋蘭圖騰崇拜的某些內涵與特徵。《楚辭》之“蘭”即帶有明顯的蘭圖騰特徵。2. 蘭圖騰崇拜的內涵，除了男女相愛，生子之祥外，還有拂除邪惡之功能。而“袪除不祥”之功用又是“生子之祥”的延伸與擴展。所以，凡是涉及到男女、生子之事者，往往提到“蘭”。3. 由於“蘭圖騰”文化袪除無子、得子護魂之內涵的潛在“牽引”，蘭文化逐漸介入、滲透、擴展到貴族生活的各個領域。最主要的標志就是紉蘭為飾。佩戴蘭花，可以袪除邪惡，可以得子護魂，使蘭花的宗教功能、圖騰功能逐步向審美功能、教化功能過渡。4. 從“致蘭得子”、“秉蘭袪邪”到“紉蘭為飾”、“喻蘭明德”，形成了滲透于貴族生活各個側面的“蘭文化”氛圍，再次說明：蘭圖騰文化最為古老、原始，亦最具傳播力量，其“原型”、“遠景”最為隱秘、遙遠。

四、《猗猗九畹易消歇 奕奕百畝多淹留——蘭花栽種歷史考述兼釋〈楚辭〉之“蘭”》指出：1.“蘭花栽種歷史”可考為：山野栽種始於春秋；庭院栽種始於戰國；宮廷栽種始於晉朝；蘭場栽種始於唐朝。其栽種方式：唐朝以前園圃栽培；唐朝開始盆栽。2. 關於春秋戰國時期栽種的“蘭”，是菊科植物的“蘭草”，還是蘭科植物的“蘭花”？古今共有三說：“蘭花”說、“蘭草”說、“蘭草”“蘭花”并存說。“蘭花”說，否定了蘭草、蕙草的存在；“蘭草”說，推遲了蘭花產生的時代。兩說都過分“單一”，不足以用來解釋、認識豐富複雜的自然世界。“蘭草”、“蘭花”并存說，比較可取，比較符合生物界豐富多元、諸物并存的客觀現象。在蘭草、澤蘭、蕙草盛行的時代，亦有幽蘭的一席之地，而且已認識她的與眾不同；在蘭花千姿百態、萬種競秀的時代，蘭草、澤蘭、蕙草也仍然存

在；符合蘭花逐步被人們所認識的漫長過程。3. 孔子所嘆、屈子所佩、曹植所咏，皆爲一物——“幽蘭”，即現代意義上的蘭科植物“蘭花”，爲中國蘭花的第一次“亮相”。

五、《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考論——兼論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指出：1. 一些學者根據“漆耳杯銘文”與“鳩杖”推測墓主是“楚太子的老師”，至於具體歷史人物又有“陳良”、“屈原”、“慎到”三說。由此，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爲“東宮之師”說，目前已風靡考古、哲學、文學諸領域。2. 本文根據金文、包山楚簡、曾侯乙墓竹簡、望山楚簡、信陽楚簡、郭店楚簡、帛書對“不”、“帀”二字不同寫法的比較，考定漆耳杯銘文應爲“東宮之杯”，而非“東宮之師”；進而據《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考定楚國太子的老師應稱爲“傅”或“太傅”。3. 通過對《周禮》、《禮記》、《呂氏春秋》有關“杖”的禮制考釋，論定所謂“八十九十，加賜鳩杖”之禮始於漢代，主要證據有三：《後漢書·禮儀志》有明確記載；《呂覽》高誘注所引“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之俗；漢墓中有鳩杖出土。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種“杖”的形制特點，亦可證明此墓“鳩杖”不是手杖。至此，則推翻了“東宮之師”說的兩大力證。4. 進而論定：屈原未擔任過太子之傅；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與屈原無關；屈原生平事迹中的三大關節（從政、放逐、沈江），在漢人記載中是大致清晰可信的；應本著有根有據、“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梳理出屈原生平的基本錢索。

六、《屈原“放逐”問題證辯》指出：屈原放逐問題的研究，是屈原生平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由於司馬遷《史記》先後涉及到“疏”、“紂”、“放流”、“遷”、“放”等，學術界對此頗多異辭。近現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黃文煥、林雲銘、蔣驥的基礎上，作局部的

調整或發揮，他們共同的前提是：屈原在郢都任職、遭讒、被疏，在漢北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被流放江南。屈原放逐問題研究，在方法論上最大的誤區是循環論證。鑒於條件，目前可以適當模糊一些、概括一些。

七、《屈原“自沈”的可靠性及其意義》指出：關於屈原自沈的可靠性是不容懷疑的，研究屈原沈江的邏輯起點應是研究屈原自沈的動機及意義。“賜死說”根據不足；“殉國說”是特殊時代的“古為今用”；“殉楚文化說”、“政治悲劇說”對主體認知不夠。而“潔身”、“殉道”、“泄憤”，皆為屈原自沈動機的不同方面，與屈原作品的情感抒發比較吻合。

八、《屈原“愛國主義”研究的歷史審視》指出：隨著以楊公驥、曹大中為代表的“屈原愛國主義否定論、局限論”的不斷出現以及近四十年的商榷、批駁，這一議題常常成為楚辭研究中學術爭鳴的一個熱點。本文從兩千年楚辭研究史著眼，指出就作者、作家而言，可以稱屈原為“愛國者”、“愛國詩人”；從內涵而言，應稱為“愛國思想”或“愛國精神”；屈原至死不離開楚國，用實際行動強化了“熱愛父母之邦”這一美好的情操，盡管當時還不能升華為一種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倫理道德，但他這一思想、行動對我們民族“最深厚的感情”——“愛國主義”的形成，具有無法估量的實踐意義與理論價值；困擾我們對屈原愛國主義作冷靜、理智研究的因素，主要有“楚國視野”與“秦國視野”的不同（空間距離）、“歷史意識”與“當代觀念”的差別（時間距離）。

九、《尋找近真的“屈原”與“陶潛”》指出：1. 屈陶二人影響於後代文人的模式凡四：A. 是陶非屈。但是陶不踐陶，僅僅停留在口頭上。B. 屈陶并舉。往往取其一點，如人格追求等。C. 非陶

非屈。既不想做屈原，又不想做陶淵明。D. 非陶是屈。執著人生，至死不懈，我行我素，九死未悔。2. 是陶非屈、是屈非陶、亦屈亦陶、非屈非陶——都是以屈原模式與陶淵明模式相對立而言的，作為兩種文化——載道與閑情、儒家與道家、進取與隱逸的代表來加以比較的。3. 著名詩人的比較應有三個層次，顯義：異、對立、矛盾；隱義：難、敬佩而不效法；深義：同、卓異、獨立。本文比較屈原與陶淵明的“異”中之“同”。4. 出身與來歷。他們均為遠世顯赫，當代沒落，家族留給他們的是：遙遠的回憶、現實的困窘、良好的教育、情緒的起伏、情感的脆弱。5. 他們對政治仕途的過高期望，對自身才能的過高估價，必然將不得志、懷才不遇，“有志不獲聘”，歸結於政治黑暗，忠佞倒置，世風日下，無一可取。6. 他們的作品，正是他們心靈發展歷程的真實寫照，是他們苦難歷程的真實記錄。準確地說，應為人生思索的“文學日記”或“日記題材的詩文”。7. 屈、陶之偉大，不在於表層上的選擇與堅持：屈原被疏被放後決不屈服，沈湘以抗；陶淵明棄官歸田之後決不出仕、終窮一生。其偉大在於他們心理自我調節、自我平衡、自我淨化、自我升華的勝利與成功；他們不掩飾自己真實的矛盾與動搖，他們能夠正確地直接面對這種矛盾與動搖，從而通過自我調節與平衡，克服這種矛盾與動搖——我們感受到的是真實可信的心靈脈搏的跳動，有血有肉的苦難人生的追求，同於常人而又超於常人的可貴之處。8. 陶淵明受到的影響與熏陶是多方面的，包括儒道兼收而偏於儒的屈原、以孔子為主的儒家、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道屈兼融而偏於屈的阮籍，等等。而就美學傳統而言，對陶淵明的影響，道家是主體的，儒家是深層的，屈原是潛在的；道家是詩歌的，儒家是哲學的，屈原是精神的。

十、《當代屈學考信錄》指出：考據、義理、辭章，為傳統治學之手段。如今，考據之學，仍不可廢，不僅適合於“本體”研究，亦適合於“史學”研究。本文對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何新《諸神的起源·續集——〈九歌〉諸神的重新研究》、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姜亮夫《楚辭通故》、呂晴飛《屈原詩歌評賞》、《楚辭研究與爭鳴》第一輯、張子偉《湘西儺文化之謎》、蔣天樞《楚辭論文集》等著作的錯訛、疏漏作了考辨。

十一、《〈離騷〉“求女”研究史略》指出：關於《離騷》“求女”喻義，異說歧解甚多，似乎已成不解之謎。概言之，大致有十說。或同一學者對“求女”問題或不一其說，或拘執一說，力貶他說。究其原因：對創作方法的理解不同；理解的範圍不同；理解的對象不同；參照系數不同。而“求女”之釋，還涉及到對屈原生平事迹的考釋，《離騷》寫作年代的確定，《離騷》創作方法與背景、原型的理解。

十二、《〈哀郢〉作意研究史略》指出：《九章·哀郢》篇的釋讀理解，作時作地作意的考證闡述，均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證與評價，所以長期以來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大熱點，二千多年的研究史共形成了十種觀點。這種歧義紛紜、廣泛參與、不斷強化的研究特徵，也體現了學術傳承、集中專注的時代特色與課題價值。目前這種人言言殊、難於統一的原因主要有：屈原生平事迹的記載過於簡略乃至矛盾；《哀郢》作品本身內涵、意象具有豐富性與多元性；不同學者對屈原生平事迹的整體把握不同；不同時代的學者在研究中有有意無意地摻入了時代意識；同一位學者往往不一其說，企圖相容各種有利之說而導致自己觀點的矛盾；種種調和融通諸家之說的努力，既表明了學術研究的進展，又為後來者提供了更高的難以破譯的學術基點。

十三、《中國近現代楚辭學史綱》指出：1. 楚辭的出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現象。兩千多年來的楚辭學史，留下了許多令人神往而又望而却步的謎團：先秦史籍為何不載屈原其人？楚辭是如何從戰國傳至漢代的？屈原作品為何不涉及家庭情況却有愛情婚姻的深刻體驗？屈原作品從不直接涉及當時的國家大事，而將視野投向遙遠的神話、傳說。《天問》不問炎、黃二帝，不問顓頊、不問伏羲，屈原作品從來沒有點到先秦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等。屈原作品的藝術水平之高，如異峰突起，且衣被百代，但其“上源”、其“發展綫索”極難描述。如何對楚辭與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作出縱橫交叉的雙向描述？如何把握屈原作品與苗族文化、古儺、民間文學作品的關係？如何把握屈原作品中抒情主人公“我”與屈原本人的關係？如何看待從楚辭中發掘或比附屈原生平事迹這一特殊現象？2. 兩千年的研究史給我們貢獻出許多啓示：研究層次、研究方法總是不斷提高、發展；許多研究者的獨到之見，逐步為歷代學者所接受；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駁、糾正或補充前人的說法；而他們自己又受到後代或同時代人的反駁、糾正或補充，從而不斷推進研究的深入，尋找“近真的屈原”；每一種學術派別、研究方法的出現，總是與當時的文化學術思潮分不開的；近現代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困惑，完全可以在古代研究史中找到原因和答案。3. 二十世紀的楚辭研究，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四個高潮：第一階段，世紀初至二十年代末期，以胡適、陸侃如、梁啟超等展開學術討論為標志；第二階段，抗日戰爭時期，以確定端午為詩人節，郭沫若創作話劇《屈原》並在重慶上演為標志；第三階段，1950年至1965年，以屈原被確定為世界文化名人為標志；第四階段，1966年至世紀末，以“中國屈原學會”成立，並連續召開六屆年會為標志。

4. 圍繞“屈原其人有無、《屈原列傳》是否可信”的爭論，在二十世紀初，尤其是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個共同參與的“學者群”，從而推進了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奠定了現當代楚辭學史的基礎。這個“學者群”包括：劉師培、王國維、廖平、胡適、陸侃如、曹聚仁、謝無量、梁啟超、胡光燾、魯迅。真可謂“一時多少豪傑”，他們的共同參與，從方法論的角度給了我們許多啓示。5. “抗戰”時期楚辭研究的繁榮，表現在地域的廣闊上，表現在研究類型的多樣上，表現在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學術論爭上，表現在研究方法的自覺思考與多樣化選擇上。

十四、《精於聲訓 他山攻玉——評何劍熏其人其學其書》指出：1.《楚辭新詁》是何氏畢生治騷的總結和結晶，亦凝聚了學術傳承、師生參與的心得與心血。2. 何氏精於考據、文字、音韻和訓詁、校勘之學，致力於《楚辭》疑難字、詞、句的箋釋，經史子集，信手拈來；廣證博引，游刃有餘，於訓詁、聲訓、校勘諸方面尤多發明。3. 何氏對王逸、姜亮夫二家似乎情有所鍾，大部分條目均引述、論證，故于王、姜二家之說肯定多、圓通多、發揮多、補證多、駁難多、糾正多。4.《楚辭新詁》長於訓詁考據之學，但又不僅僅局限於聲、形、義三者的探索與校理，還注意借助天文學、地理學、民俗學、考古學乃至於生物學諸學科知識，來破釋《楚辭》詞句中的疑難，這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又以天文學爲著。5. 何氏推崇高郵二王、俞樾，往往用其說而發揮之，但受二王、俞樾局限的影響亦很明顯，全書動輒“通轉”，隨意破字，則難免主觀臆斷，通假字辨識過多過濫。

十五、《金開誠〈屈原辭研究〉、〈楚辭選注〉平議》指出：《屈原辭研究》的特色爲：選擇文獻內證，立足楚辭文本，堅持實事求是的原

則，在前人的基礎上尋求突破；熟練運用系統論，圍繞作品內部分析的疑點、難點，通過製作模式進行系統分析，形成一種客觀探求對象系統性質的有效手段，推進楚辭文本研究向縱深發展；《楚辭選注》的特色為：深入淺出，平和簡練，流暢自然。有時也會不動聲色地插入自己的學術思想，或提出新見，或概括得體，或分析透徹，或暗中提示，而且與前後介紹大致吻合，相互連貫，在平和中肯的敘述裏體現自己的學術見解；盡量考慮到初學者、一般讀者閱讀古代作品的困難，在注釋中追求通俗、詳盡，串講明晰，概述句意盡量采用“直譯”，便於一般讀者“入門”。

十六、《文學人類學的考古報告——蕭兵的楚辭研究與弗萊的原型批評》指出：1. 蕭兵不僅把《楚辭》文本當做一個“標本”放在解剖臺上進行剖析，同時也把它視為一種有生命的“話語”而與之進行超越時空闕限的“對話”。2. 不管自覺與否，蕭兵采用的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弗洛伊德學說相並列的“原型—神話批評”理論。原型是一些聯想群，通過一些秘傳的符號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儀式或神話；但這些“聯想物”又是複雜多變、無限延伸、難以釋讀、難以駕馭的“可交際的單位”，所以原型批評可以拓寬視野，貫通古今，又有“假說”、“猜想”的不可靠性與危險性，一旦對“聯想物”的捕捉有誤，一旦對“秘傳的符號”涉想太過，那麼推導出的結論就可能有誤，發生比較文學家所謂的“過度詮釋”問題，這可以說是學科本身的局限與缺憾。3.《楚辭新探》等書通過對遠古精神文化的辛勤發掘，為我們展示了遙遠而淺淡的原型、背景或傳統。這是楚辭學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就之一，亦是“文學人類學考古”題內必有之義。4. 蕭氏的許多論述屬考證性，許多巫術儀式的索究，往往以關鍵字詞的訓釋為基礎，從形、音、義諸方面力證，且伴以物

質考古旁證,使得其原型假說或猜想堅實有據,精神考古的結論比較容易成立,但有時也顯得無能為力,在關鍵字詞的訓釋上即以假說推斷。

是為序。

周建忠

二〇〇二年九月一日于枇杷居